

| 论衡 |

邓秉元——著

新文化运动 百年祭

哪一个「五四」？／新青年的「诞生」
传统经学的困境与新文化运动／「大爆炸」之后的青年宇宙
用科学整理国故／经学已死，经学史当兴？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宿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邓秉元——著

新文化运动 百年祭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邓秉元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论衡)

ISBN 978-7-208-15756-9

I. ①新… II. ①邓…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文集

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K261.107-53 ②K8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3416 号

责任编辑 张钰翰

装帧设计 范昊如 夏雪等

论衡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邓秉元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5

字数 124,000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56-9/K · 2824

定价 48.00 元

序 言

2015年初,由于承乏为复旦校庆编辑周予同先生文集之便,重新阅读了清末民初不少相关史事。适值《新青年》创刊100周年,遂撰写了《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文,作为该书导言。哪知竟然一发不可收,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因为书评、演讲等各种机缘,陆陆续续写就六七篇评论文字。文章长短不一,但大体以人物为重心,关注的话题也颇有衔接之处。首先是晚清以来传统学术转型的若干面相,其次是宋元明清以来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再次则是传统社会后期政治结构的变迁。由于所涉及的人事只是吉光片羽,即便有整体性关怀,也只能作为一个大而化之的叙述背景,供历史评论作蜻蜓点水之用。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许多变化,尽管在形式上因为西方文明大量涌入,而表现出与元明时代迥然相异的面貌,但在精神结构方面依然是一脉相承。作为个体,每个人似乎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但作为历史观察,我们却不得不在既定的情境下,去努力辨析时势的各种变化。

人类自有历史意识,便应该有了史论吧。《尚书》已经包含不少对过往时代的评论。《左传》的“君子曰”,百家诸子的

杂议，正史野史的论赞，汉晋以下的文章，都是历代史论的渊藪所在。有些或许只是对历史事件的兴趣，有些则涉及大势的总结，有些则毋宁说只是为了表达对现状的理解。所以史论中既有传统的政治理论，也不乏历史哲学，有的甚至如陈守实先生所言，“史论即政论”了。历史就像一个万花筒，而史论便是在对历史观象。到底所观之象如何，还要看观象者自身的视野所及。

当然，对历史发言固然容易，发人深省的史论其实却绝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或许只是告诉后人，昔时昔地，曾有昔人，发此一段闲议论而已。晚清以来的中国，时势变化常常匪夷所思，出人意料，似乎总在分水岭处打转，但格局却与晚明清初并无根本不同。闲议论又有何用呢？只不过历史家与哲人的意义，总是如太史公所言，“述往事，思来者”，让人类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有所晓然。

文字既已问世，便拟置诸天壤。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副编审的好意，愿意把几篇小文都为一集，惠予出版。考虑到今年特殊而又平常的意义，以及这几篇文字的前后背景，于是直接以《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为题。书中倘有任何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方家指正。

是为序。

邓秉元

2019年2月16日于沪上

目 录

序言 / 1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兼论周予同与 20 世纪的经学史研究 / 1

章太炎与近代经学一瞥 / 95

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 / 113

梁启超的修身三书 / 139

纪念马一浮先生 / 159

潘雨廷《诗说》漫谈 / 177

王安石与北宋时期的政治共识 / 187

王阳明与他的时代 / 207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兼论周予同与 20 世纪的经学史研究

从清末到民初,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很难自我定位的时代。不过短短数十年间,这一群体便完成了自身从传统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变,同时也发生了复杂的分化。传统所谓“学而优则仕”尽管未被完全打破,但入仕通籍的法则已经改变,仕在某种意义上回复了“做事”的原始义。分化后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两类,一种是所谓专业知识人,一种则成为职业革命家或政客等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当然也不排除许多人一身二任,时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尽管不无贬义,却庶几可以当之。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身处转型之中的历史学家周予同,曾经对此有过观察,并称自己这一代人是所谓“变质的士大夫”。^①

^① 周予同《我们的时代》,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下文凡收入此书及拙编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论著选编》的论文,书名不再出注。

周予同显然有理由以此自居。尽管只是生长在较为寒素的廪生及塾师之家，^①但当 1898 年他在浙江瑞安出世之时，清帝国的统治虽已摇摇欲坠，之后却仍然维持了近十四年时间。他想必还有机会看到 1905 年废科举以前父辈参加科考，也还一直难忘儿时所见身为汉学大师的同乡孙诒让，备受乡人尊敬的景象。

当然，直到今天，给传统所谓“士大夫”下定义仍然很难。假如说孔子以前大夫、士还是贵族阶级的两种身份，到了孟子的时代则肯定发生了变化，后者便把有恒之士与无恒之民相对，士与民都成为德性概念。大概地说，魏晋的士族是指诗礼传家的簪缨世胄，科举时代以后的士大夫则主要指代可以读书弋取功名的群体。通籍以前为士，通籍以后则如《礼记》所言“服官政”，为大夫。这个群体或在朝为官，或在乡为绅，其勇者尚能以师道自任，在当时的社会中处于君权与民众之间，三足鼎立，相互平衡。这是清代以前的基本社会格局。

很显然，以“变质的士大夫”自称，表明周予同不仅思考过士大夫的具体意义，而且也注意到了这一群体的变化。也正是因此，1937 年，在一篇面对中学生的笔谈中，周予同不

① 关于周予同生平，凡见于《自传》及拙编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论著选编》书后所附《周予同生平与学术简表》的，以后不另出注。

仅希望青年一代可以摆脱“士大夫的末运”，“变为知识分子或生产技术人员，对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而且痛切于自己一辈人的堕落：

眼看见一批一批的青年们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而终于以腐败的官僚、政客、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在任何机关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变了质的士大夫的丑态真可谓扮演到淋漓尽致了！^①

为了避免这种变质士大夫的丑态，在周予同的大半生中他都小心翼翼避免介入实际政治，通过学术与出版事业践行自己改造社会的愿望，但最终却不得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作为一个毕生发掘传统经学底蕴并试图否定之，以迎接新文化的历史学家，却为已经到来的新文化所吞噬，这在同辈学者之中不仅不是个例，而且毫无疑问算是显例。

将近二十年前，周予同先生的著作曾是我了解经学史入门书之一。那时对于这位先是被“文革”小将称为“反共老手”，后来又被称为“民主斗士”，甚至“共产党同路人”的学

^① 《我们的时代》。

者，曾经以为定位已明，反而丧失了深入研究的兴致。直到去年冬天，因为承乏编纂周予同先生的选集，只好再一次重读周先生的著作，而且尽可能与 20 世纪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相比勘。渐渐的，周先生的形象先是由清晰变得模糊，然后又一点点重新清楚起来。这还是那位周予同吗？我不禁有些惶惑了。

一、哪一个“五四”？

历史地讨论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学人及其学术很难。姑且不提李鸿章那个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著名慨叹，只消一瞥处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当中的中国，20 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政权更迭，下半叶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以及由此引生的学人身份的复杂多变、思想的矛盾纷呈，便经常使人感到目不暇接，难于置喙。

譬如，想要理解作为“五四”青年一员的周予同，便很难绕开对“五四”的理解。但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对它的争议或解释便已众说纷纭。局限于“五四”事件者有之，以政治运动视之者有之，以新文化运动解释者亦有之，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很难说哪一种更符合历史实相。所区别的或许只有境界的高低。在这些争议中，因为立场不同而产生

的解释最容易辨认,诚如周策纵所总结的,从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保守主义者眼中的文化灾难,到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种种相互歧异甚至矛盾的解释背后,是因为“自 1919 年起,五四运动中的新知识分子因其在思想意识、专业兴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态度以及与政治的实际关系等方面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①

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9 年“五四”事件及 20 年代一系列文化及政治争议。这也是本文讨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基本立场,在多数情况下两者可以互用。问题是,反传统与西化固然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关键内容,但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算作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基调?同样,人所艳称的所谓个性解放、反专制、反抗帝国主义云云,尽管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应有之义,但在何种意义上与颠覆传统形成有机的联系,依然是考验史学界的重要课题。

譬如,一种耳熟能详的历史定位是,“五四”是一次个性解放运动。这种观点无疑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却表现不出“五四”的特色何在。倘承认 20 年代以降,许多思想史研究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第 476 页。

业已揭示的一个事实，即至少在晚明时代由王学所催生的社会思潮中，已经存在大量个性解放的声音，便可知个性解放不必与传统本身相矛盾。特别是在晚清，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曾借助王学试图突破传统思想的藩篱。那么，为什么要反传统？

另外，假如说“五四”是为了“反帝反封建”，这在“冲破礼教”“抵制日货”的声音中似乎也并非无稽之谈；但如果按照这一派学者自己的意见，包括康有为的保种大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谭嗣同等对君学的颠覆，都是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学术”之列，那么所谓“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孔学似乎足以完成，何必非得一声炮响之后飞来的列宁主义。除非这种见解只是为了证明一种所谓领导权的论述，即五四运动已经是由无产阶级所领导，尽管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在“五四”事件之后才得以产生。不消说，这种观点也早已被前人的论著所反驳。

新文化运动在诞生伊始，便有了它的反对派。除了钱玄同假冒王敬轩的自我炒作之外，在学者群中，包括桐城文人，包括尚未崛起的新儒家，也包括 1922 年已经开始集结的“学衡派”。半个世纪以后，当许多人感喟于“五四”激烈反传统所造成的弊端的时候，在“五四”的支持者中随即产生了另外的观点。

李泽厚认为,五四运动包含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两部分。前者是为了救亡,而非个人自由、平等与独立,救亡最终压倒启蒙,“封建传统”的遗毒不仅没有被肃清,而且变本加厉。^①此文用意,固然是在不损害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上,为 80 年代的“新启蒙”摇旗呐喊;但同时也可以用来为“五四”的激进反传统辩护。事实上,李文的根本问题是完全从历史目的论的视角出发,因此线条过于单一,尽管注意到中共系统以外的知识分子存在,但却未能提出有效的框架予以解释。

另一种观点似乎是为了纾解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的历史形象。譬如业师朱维铮先生便提出,所谓“打倒孔家店”实际是指“朱家店”,^②即以朱熹为代表并被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化的程朱理学。这仍是从“反封建”的角度立论;不过,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是全盘反传统,便包括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部分。针对孔子问题,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钱玄同便公开指明,孔家店分老牌、冒牌之分,前者显然是指孔学及历代经学。^③

①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收入氏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重识五四——专访朱维铮》,《瞭望东方周刊》2009 年第 19 期。

③ 老牌的孔家店是指孔学和历代经学,冒牌的包括古文、骈文、八股、求仙、狎优等一般文化。参《孔家店的老伙计》,载《钱玄同文集》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8 页。

林毓生则在承认所谓“全盘的反传统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新论。他首先意识到，“无论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求变的观点，或者当时所采纳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和西方科学的思想 and 价值，都不能用来解释‘五四’反传统运动的全盘性”。^①那么这种“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来自何方？那就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换句话说，改造世界观先于政治与经济改革。^②于是他转而论证，这种思想文化先行的传统不仅在此前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那里早有先例，而且还植根于古老的儒家传统。

不过，姑且不说有研究者批评他寻章摘句，简单以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的若干说辞来论证近代儒家学者“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倾向，那显然忽视了洋务运动以来所有技术与建制方面的努力。至于以梁启超为例，更显然没有注意《饮冰室合集》里面大量革新政体与法制方面的论著，以及梁氏本人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同时，把这种思维归咎给传统儒家，同样没有注意到儒家在传统时代的建制性存在。

也正是因此，林毓生的观点，似乎尚不如梁启超那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更有解释力。在后者看来，洋务运动以来对西

①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 页。

② 同上书，第 45 页。

学的接引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复由制度到文化这样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只不过梁说的局限在于,晚清这种对西洋文化逐渐接受的逻辑,在少数思想开放的士大夫那里或是事实,但何以新文化运动会引起那样大的社会震动,尚需要另辟其他的解释途径。

二、新青年的“诞生”

说反传统与西化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的基调,似乎已无疑义。^①问题是这一现象如何发生,或者说,为什么会被多数学生所接受。

许多学者都曾不厌其烦地枚举过,五四运动前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或社会变化,以丰富对这一运动在发生学层面的理解。譬如“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尊孔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巴黎和会上中国的窘境,对美国的失望与对苏联的憧憬,高等学校的教育革新,欧美留学生对文化思想界的冲击,“五四”以后的学生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凡此种

^① 周策纵认为“全盘反传统”这顶帽子对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也是不合适的。参《五四运动史》香港版序,前引书,第13—14页。周予同甚至认为“疑古派”就是传统的。参《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本文的反传统是指知识体系意义上的。

种,不一而足。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形容的,历史本来便像分光镜,有着多重的线索并存。^①

不过,有一个因素假如说没有被忽视,至少也在疏于强调之列。那就是 1910 年代现实中的学生群体的精神状态。实际上,五四运动之所以首先是一次学生运动,或者说青年的运动,就是因为所有的社会因素最后都作用于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并成为新文化作用于社会力量的枢纽所在。有了这个枢纽,新文化的影响才迅速达到商界、工团,并渐次及于农村社会。因此,假如说各种矛盾的积累如同“万事俱备”,那么学生的心理状态便是“所欠东风”,相比之下,作为具体事件的巴黎和会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许多思想,在现实指向上与晚清时代很难说有根本性差别。在前述文章中,李泽厚便曾感到疑惑,就以“资本主义”的西学反对“封建传统”的中学而言,新文化运动与晚清“并无根本的不同,甚至在形式主张上也相当接近或相似。那么,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有空前的气势、作用和影响呢”?

我们知道,即便是激烈反孔的声音,在晚清也已经出现。梁启超 1902 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便已经

①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序,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论及不少批孔之说。在康有为呼吁建立孔教的同时,其论敌章太炎便大泼冷水,1904年在《馥书》重订本中发表《订孔》一文,援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白河次郎尖锐批孔的言论,对孔子大张挞伐,认为孔子除了颇具“才美”以外,其学问不惟不如荀、孟,只可比诸刘歆。^①据说“余杭章氏《馥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②稍后,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的《论诸子学》一文,^③更批评“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并泛引《庄》《墨》之说,来证实孔子的“巧伪”。可以说,反孔的声音不惟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事实上还深受前者的影响,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率先发表《孔子平议》,章太炎的这个观点便赫然在内。

当然,具体观点的类似并不能掩盖晚清与“五四”两个时期思想的根本歧异,这一点稍后再行讨论。不过为什么类似观点在“五四”时期会产生那样的影响,确实是一个有力的问题。李泽厚的结论是,每个时代有自己的中心议题,从晚清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斗争首先是先进知

① 《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朱维铮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136页。

②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乙巳年第六号《社说》。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光绪二十八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朱维铮、姜义华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